

古典新刊 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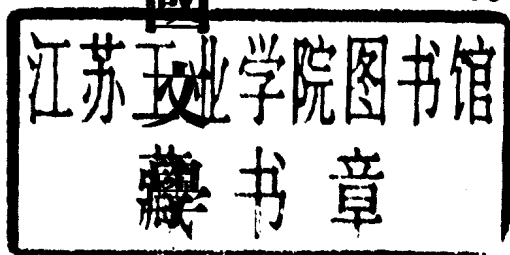


——中國文學欣賞導讀全集——

中國文學的特質

古典新刊
59

中國



的
特質

莊嚴出版社

• 59 刊新典古 •

中國文學的特質

著作者

蔡梁

正啓

華超

出版者

莊嚴

出版

文社

發行者

鄭惠

出版

文社

發行所

莊嚴

出版

文社

臺北市士林區國路一〇〇號
雙子星大樓二樓二號

電話：八三五五九六二一

郵政劃撥帳戶一一一九九號

定價新臺幣六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換更回寄請、裝倒，損破、頁缺

目錄

中國文藝思潮

一、民族特性·····	一
二、宗教與哲學·····	一一
三、對於自然界·····	二四
四、戀愛·····	三五
五、民族思想·····	五〇
六、非戰·····	六四
七、社會經濟·····	七六
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·····	八七

中國文藝思潮

蔡正華

一、民族特性

什麼叫做中國文藝思潮？思是思想，潮是潮流，寫一部中國文藝思潮，至少須把已有的文藝作品，一一分析其思潮背景，以求能找到一個線索，然後說明其嬗遞轉變之故。可是談何容易：第一，中國文藝上的遺產，最為豐富，要在這浩如煙海之中，找尋一個線索，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；第二，構成這背景的原因，又很複雜，非在宗教、哲學、社會、經濟各方面都有相當的認識不可；第三，中國民族自有他的特性，就思潮的轉換與變遷而言，便和西方民族完全不同，根本上決不能用西方文藝上的各種主義，來衡量一切的。

那末，一部二十四史，究應從那裏說起呢？我們姑先談一談中國民族的特性。一個民族的特性，最好和其他民族比較，便不難顯露出來。吉卜寧 (R. Kipling) 曾有這樣一句詩：

「東方終是東方，西方終是西方，雙方是永遠合不來的。」(For East is East, and West is West,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.)

話雖簡單，却不能不說他觀察力的銳敏，東西民族，根本不同。朱光潛在〔長篇詩在中國何以不發達〕一文中說得好：「西方民族性好動，理想的人物是英雄；中國民族性好靜，理想的人物是聖人。」把動靜兩字來形容東西民族性的不同，原不過是程度上的差異，因為沒有一個站得住的民族，不向前活動的，但是中國的民族性終是偏於靜的方面多，是消極過於積極的，是陰柔勝於陽剛的，林語堂謂其「頗似女性，腳踏實地，善謀自存，好講情理，而惡極端理論。」——見〔中西文化之精神〕一文。這一種民族性，在文藝方面的影響，最是顯著。羅素(B. Russell)說：

「西洋的浪漫主義運動，引人向熱血沸騰的路上走去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據吾所知，是沒有類似這一回事情的。中國古樂，有的確是很美！但其音調靜穆，若非洗耳恭聽，萬萬辨別不出來。在美術上，中國人力求其細膩，在生活上，則力求其近情。他們決不崇拜那無情的偉男子，也決不讓那熱烈的情緒表現在外，不受節制。」——〔The Problem of China〕單說那〔三百篇〕的詩罷。〔三百篇〕如果真經孔子一手刪定的話，第一篇便是〔關雎〕，那就不是出於偶然的。

「關雎」是一首求愛的詩，寤寐以求淑女，「求之不得」，甚而至於「輾轉反側」。然也不過描寫自己一方面的相思之苦而已。若換上一個西方的戀人，處此境地，正不知作何感想？恐非拚個你死我活，斷然不肯放手，全詩至第三章，雖已轉為繁絃促節之音，而詩中「君子」，仍不失其「性情之正」。即以第四、第五兩章而言，一層進似一層，終於心滿意足，如願以償，却又說至「琴瑟友之，鐘鼓樂之」，戛然而止，所以孔子歎為「哀而不傷，樂而不淫」，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

這便是「三百篇」對於人生的理想態度。章潢謂「詩之在〔二南〕者，渾融含蓄，委婉舒徐，本之以平易之心，出之以溫柔之氣。」因此自來皆稱「周南」「召南」為「盛世之音」——「世次」說之可信與否，姑置不論。隨便再舉幾個例：如「小星」中的「肅肅宵征」者，我們雖未能確定其為賤妾，為小臣，抑如胡適之所說送鋪蓋、上客店的妓女，然而無論如何，其身世之感，則凡讀此詩者，皆可在想像中得之。試看這身世之感，在詩中是怎樣表現出來的：

「夙夜在公，實命不同。」

「抱衾與裯，實命不猶。」

把「夙夜在公」、「抱衾與裯」之苦，輕輕的歸之於「命」。命則非人力所得而強爭，於

是一腔無可發洩的怨憤，便散歸於「烏何有」之鄉，只有心平氣和，循分自安了。管子說：「止怒莫如詩。」真是不錯。

又如「召南」之「江有汜」，舊說：「美媵之勤而無怨也。」細味詩意，確是描寫一個棄婦的苦悶，但其措辭委婉，真能了解「知足常樂」的道理：「不我以，其後也悔。」已遭遺棄，仍作萬一之想，希望其丈夫能一朝悔悟，則「破鏡」未必無重圓之日。「不我與，其後也處。」乃更作退一步想，即使真個恩斷義絕，他丈夫對於她，也該有一個安排處置的方法。這兩章全是「偶然」之辭，在實際上，希望已屬渺茫得很。可是到了後來，她的丈夫竟會過門不入，得新忘舊，已是千真萬確的了，你猜，她所採取的是那一種態度？「不我過，其嘯也歌。」可謂善自寬慰之至，「十九首」的「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」，便是這兩句的註腳。史密士（A. H. Smith）曾說：

「中國人雖明明已在失望之境，而表面上却仍不露失望之色，甚至至於毫無希望，或竟與所望適得其反的時候，還能掙扎著、生活著。中國人的心境，不像他國人民的浮躁，蠢蠢欲動，和十九世紀末葉的人民，全不相同。他們並不計畫如何才能痛痛快快的享受一下。也似乎不希望會有這樣痛快的一天。」——（Chinese Characteris his）

「三百篇」作者的思想，大概都是如此。「溫柔敦厚」為詩教，這便是所謂溫柔敦厚。焦循

在〔毛詩補疏〕序中，解釋「溫柔敦厚」四字說：「不質直言之，而比興言之；不言理而言情；不務勝人，而務感人。」「溫柔敦厚」之旨，在文學技術方面，用的是「含蓄蘊藉」的表情法——「不質直言之，而比興言之」——梁啓超曾謂：「這種表情法，向來批評家都認爲文學正宗，或者可以說是中國民族特性的最真表現。」他又說：

「這種表情法，和前兩種不同——指文中所述『奔迸』的與『迴盪』的表情法——前兩種是熱的，這一種是溫的；前兩種是有光芒的火燄，這一種是拿灰蓋著的燼炭。這一種表情法，也可以分爲三類。第一類是情感正在很強的時候，他却用著很有節制的樣子去表現他，不是用電氣來震，却是用溫泉來浸，令人在極平淡之中，慢慢的領略出極淵永的情趣——他所引的是〔雄雉〕〔采芣〕〔君子于役〕三篇——第二類不直寫自己的情感，乃是用環境或別人的情感烘托出來的——他引的是〔陟岵〕和〔東山〕兩篇——第三類把情感索性完全藏起不露，專寫眼前實景，或虛構之景，把感情從實景上浮現出來——他引的是〔七月〕一篇。」——〔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〕

梁啓超在此文中，又說：「〔小弁〕的特色，是把磊磊堆堆，蟠鬱在心中的情感，像很費力的才吐出來；又像吐出，又像吐不出，吐了又還有。那種表情方法，專用語無倫次的樣子，一句話說過又說，忽然說到這處，忽然又說到那處。」他以爲〔黍離〕的表情法，是「胸中有種種甜

酸苦辣，寫不出來的情緒，索性都不寫了，只是咬著牙齦，長言永歎一番。」〔鴛羽〕〔柏舟〕兩篇，都是表現一種極不自由的情感，「他們在飲恨的狀態之下，情感才發洩到喉嚨，又嚥回肚子去了，所以音節短促，若斷若續。」他的結論是：

「〔詩經〕中這類表情法，真是無體不備，〔小雅〕十九皆是，真所謂溫柔敦厚，放在心坎裏頭是暖的。〔詩經〕這部書所表示的，正是我們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狀態，這一點無論後來那位作家，都趕不上。」

梁啟超所說，大致不錯，溫柔敦厚的詩教，確是中國文學的特色，至於健全與否，却是又一問題，尙待討論。

但陳衍在〔近代詩鈔〕序中，却又舉出了幾首不溫柔、不敦厚的詩：「溫柔敦厚，孔子之言，然孔子刪詩，〔相鼠〕、〔鴉奔〕、〔北門〕、〔北山〕、〔繁霜〕、〔谷風〕、〔大東〕、〔雨無正〕、〔何人斯〕，以迄〔民勞〕、〔板〕、〔蕩〕、〔瞻印〕、〔召旻〕，……亦不盡溫柔敦厚，而皆勿刪。」那末這幾首詩果是不溫柔，不敦厚的麼？

「〔相鼠〕確是咒詛之辭，罵他「不死何爲」，責其「胡不過死」，然細味仍是「多行不義」，「厚將崩」之意，並無劍拔弩張之態，却有憫憐愛惜之意。何以謂其有憫憐愛惜之意？惜者惜其不知禮儀，聲名狼藉，憐者憐其不能速死，保全令譽，正是一點忠厚之心。

〔鴉奔〕舊說以爲刺衛宣之作。鄭伯享趙孟，伯有曾賦此詩，趙孟指爲「牀第之言不踰閭」，詞意率直，似傷忠厚，但方玉潤說此詩，却解作「人雖無良，吾不敢不以爲兄，不敢不以爲君」，語意仍極深婉。

〔谷風〕也是棄婦怨其故夫之辭，與古詩〔上山採蘼蕪〕，情事相類。詩中歷敘持家的辛勤，臨去的眷戀，回憶過去，絮絮叨叨，把胸中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訴之感，盡情的宣洩出來。但總覺得自憐之意多，而責人之語少。「毋逝吾梁，毋發吾筭」兩語，尙有猶猶相爭之心，接著又說，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」，到底只有放手，只有犧牲一切。顧頡剛札記中謂「〔邶風·谷風〕，與〔小雅·谷風〕，母題相同，〔小雅〕一首，不如〔邶風〕一首曲折」，故假定〔小雅〕一首爲原有之作，而〔邶風〕一首，乃是經過文人潤飾的。〔小雅·谷風〕有「無草不黃，無木不萎」之語，也與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」同意。

中國人最好反躬自省，最善委曲求全，和西方人恰恰相反。〔雨無正〕寫歲饑民亂之象，有「淪胥以鋪」之懼，却以痛哭流涕了之，所謂「哀不能言，風思泣血」也。〔民勞〕作爲相警之詞，曰「無良」，曰「惛愦」，曰「罔極」，曰「醜厲」，曰「縶縶」，可謂窮形盡相，然所望仍不過是「小康」，苟且偷安之意可見。〔何人斯〕可算是一首痛罵的詩，開口便說「其心孔艱」，以後便盡量描寫識人的性情無常，行蹤詭秘，而斥之爲「爲鬼爲蜮」，「有靦面目」。然先以「彼

何人斯？」爲問，不肯明言其人，用心已極忠厚。方玉潤說此詩，謂：「未肯遽與之絕，仍望其來者再，至欲出三物，以與盟心，亦因茲昔和好，不啻如璫如篋之相應而相和，今忽決裂至此，非君子交友太道，故不惜委曲以相望。」即如末句：「作此好歌，以極反側」，也仍有留戀之意。

胡適之說：「〔大東〕是描寫一個貧富不均的社會。」富貴的太富貴了，貧苦的太貧苦了。「糾糾葛屨，可以履霜」，「葛屨本是夏天穿的，如今這些窮工人，到了下霜下雪的時候，也還穿著葛屨，怪不得那些慈悲的詩人，忍不住要痛罵了。」詩中把東國愁怨，西人驕奢，互相比較，更覺難堪，然末段忽然歷數天上星漢，「大放厥詞」，仍不免爲一種薄弱的呼聲。

天意難違，而天意却是很渺茫的。詩人之意，人們大可不必與天爭，爭也徒然。「〔北門〕爲仕不得志之作，外有敦迫之苦，內有交謫之憂，無可奈何，歸之於天：「已焉哉，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」這是後來蘇季子、朱買臣所萬萬做不到的，話雖是傾箱倒篋而出，然並沒有和境環奮鬪之心。「〔北山〕與〔北門〕同一難堪，勞逸對舉，更說得淋漓盡致，可是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尙有何法可以避免？

〔蕩〕之詩，開頭便說：「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。」

〔板〕之詩說：「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瘁。」

〔瞻卬〕說：「瞻卬昊天，則不我惠，孔填不寧，降此大厲。」

〔召晏〕說：「晏天疾威，天篤降喪。」

又說：「天降罪罟，蠢賊內訌。」

〔正月〕說：「民今方殆，視天夢夢。」

又說：「有皇上帝，伊誰云憎。」

又說：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，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跲。」

詞雖哀而遇愈苦，何嘗有一點抗爭的精神？

胡適之把這時代的思潮，分成五派：第一派爲憂時派，引的是〔節南山〕、〔正月〕、〔黍離〕、〔園有桃〕諸篇。第二派爲厭世派，引的是〔兔爰〕、〔隰有萋楚〕、〔苕之華〕諸篇。第三派爲樂天安命派，引的是〔北門〕、〔衡門〕諸篇。第四派爲縱慾自恣派，引的是〔摯兮〕、〔蟋蟀〕、〔山有樞〕諸篇。第五派爲憤世派，引的是〔北山〕、〔伐檀〕諸篇。

他說：「憂時愛國，却又無可如何，有些人便變成了厭世派；有些人到了沒法想的時候，只好自推自解，以爲天命如此，無可如何，只好知足安命；有些人抱了厭世主義，看看時事不可爲了，不如遇飲酒時須飲酒，得高歌處且高歌。」

這幾派都是消極的，至於最後一派，他却稱之爲憤世派，又稱之爲激烈派。他以為「這些人對於黑暗的時局、腐敗的社會，不肯低頭下心的忍受，受了冤屈，定要作不平之鳴。」他說：「

到了〔伐檀〕和〔碩鼠〕的詩人，已漸有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。你看那〔伐檀〕的詩人，對於那時的君子，何等冷嘲熱罵；又看那〔碩鼠〕的詩人，氣憤極了，把國也不要了，去尋他們自己的樂土樂國；到了這時代，思想界中，已下了革命的種子了。」

有人評胡適之所說云：「前四派只能算作一個頹廢派，後一派雖因力量薄弱，不能作積極的抗爭，却敢於冷嘲熱罵，所以具有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。」可是我們仍須記清，這點勃勃的獨立精神，也並不是怎樣激烈的。〔伐檀〕雖是冷嘲熱罵，說來仍甚宛轉，不斥為小人，而反尊為「君子」，即其存心忠厚之處。〔碩鼠〕之「願適樂土」，一種避免現實環境之心，昭然若揭，與胡適之所謂樂天安命一派，並無多大區別。

〔詩經〕中惟有〔秦風〕，略具一點慷慨激昂的氣概。秦在當時是個新興的尚武民族，〔車鄰〕〔駟鐵〕〔小戎〕諸篇，說的都是車馬田獵之盛，〔無衣〕的「同仇」，〔黃鳥〕的哀三良，音節尤為高亢。但是「小戎」中的「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」，「厭厭良人，秩秩德音」，仍是描寫一個理想上的人格，尤其是〔蒹葭〕一篇，優游閒雅，音節又與其他各篇迥異了。

這樣一個溫柔敦厚的態度——儒家的詩教——是值得注意的，因為他籠罩了全部的中國文學史，在下列所討論的各個問題中，處處可以看出來，佛老盛行之後，更是推波助瀾，變本加厲，直至新文學運動開始才把這態度根本推翻了。

二、宗教與哲學

嚴格的說，中國並無所謂宗教。孔子之被視為教主，在基督教輸入以後，乃是最近的事。道教在根本上不成其為宗教，朱子說得好：「佛家偷得老子好處，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。」可以當得起教主兩字的只有墨子，但因經不起儒家的排斥，早已銷聲匿跡，直到最近，才有人注意到他。至於佛教，當然是一種宗教，但自傳入中國之後，也早已改變性質，失却其本來面目。所以一個孔子的信徒，同時可以談禪，做「青詞」，並行不悖，無怪西方教士不能了解，永遠打不破這啞謎了。

然而中國人却又不完全信從無神論（Atheism）。〔詩〕〔書〕中的「天」、「神」、「帝」、「上帝」、「旻天」、「昊天」，似指冥冥中的一個主宰，超出於人世之外，操有吉凶禍福、生殺予奪之權。此外紀傳中所指的上下神祇，大如日月星辰、風雨雲雷、山川河嶽，小至羽毛鱗介、寵奧門戶，道井中雷，無一不有祭祀的典禮。祭鬼之禮，尤為隆重，春祠夏禴，秋嘗冬烝，應有盡有。可是這許多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，却都高高在上，和我們並不發生多大關係。孔子曾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；又說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；又說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。」他自

已便是一個十足的懷疑論者，所謂敬天尊祖，原不過盡人事以待天命而已。

天命兩字，在經傳中爲習見，即使日常談話中，也常聽到人說天意如何如何。這種說法，本與西方人提到上帝，一般無二，但其含義，却迥不相同了。西方人常說他們所崇奉的上帝，是一位愛惜人類的天神，對於世上一切生物，確有明明白白的關係；世間不論那一種生物，都在他的顧慮之中。中國人對於天的觀念則不然，是無人格的，態度又極神秘而不可測度，對於人的關係，也是十分模糊不清，天可以隨便去做什麼事，也可以什麼都不做。關於這一點，東西便大有出入。但類似西方人所說的上帝，墨子也曾講過。墨子以爲天是有意志的，「天志」欲人「兼愛」，凡是順天之「志」的，皆可得福，逆天之「志」的，一定招禍，禍福在人而不在天，與孔子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的定命論(Fatalism)，恰恰相反。但後來墨學，何以忽然會中絕呢？一方面固由於儒家的排斥，一方面也由於不合中國人實事求是的特性。林語堂說：

「中國的人文主義者，既認定人生目的，在於今世的安福，則對於一切不相干的問題，一概毅然置諸不理。宗教之信條也，玄學之推敵也，都摒棄不談，因視爲不足談。故中國哲學，始終限於行爲的倫理問題，鬼神之事，若有若無，簡直不值得研究，形而上學的啞謎，更是不屑過問。」

在宗教哲學方面，西方人以爲成問題的，在中國人看來，都不成問題。中國人用實事求是的

頭腦，去解決這種種問題，一切也就解決了，而且解決得十分直捷了當。這種態度，在文藝方面，會發生怎麼樣的影響呢？朱光潛說：

「就民族性說，中國人偏重實際而不務玄想，就哲學說，倫理的信條最發達，而有系統的玄學，則寂然無聞。就文學說，關於人事及社會問題的作品最發達，而憑虛結構的作品，則寥若晨星。」——〔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〕。

我們若打開〔詩經〕一看，三百篇中，可說沒有一篇是含有熱烈的宗教信仰，與玄深的哲學思想的。裏面所發揮的，只是這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，在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間的實踐倫常之下，宣洩其思想感情。〔詩經〕中並無神話，並無不近人情的英雄。〔生民〕的「履帝武敏歆」，〔商頌〕的「天命玄鳥」，似乎是神話了，但又說得這樣質直，全是敘述事實的口吻，並無絲毫神話的意味。即後來〔古詩十九首〕，也大都是逐臣、棄妻、朋友關絕、遊子他鄉、死生新故之感。在〔迴車駕言邁〕、〔驅車上東門〕、〔去者日以疎〕、〔生年不滿百〕這幾首中，確曾提出了一個生死的大問題，但說來說去，還不過是「年命朝露，人生如寄」八個大字。他們想解決這問題麼？簡直不想去解決他，因為這是無可解決，且也無須解決的。〔詩經〕中所包含的思想如此，但我們也不可忘却了〔楚辭〕。

陸侃如在〔中國詩史〕中說：「古代北方有兩個民族，一是漸漸衰落的周民族，一是漸漸興